

鲁汶南怀仁基金会 由“台湾圣母圣心会”以及“台湾教友”成立于台湾 目的是与“华人交流合作”

圣母圣心会 韩德力神父

“圣母圣心会”创始人南怀义神父定以“中华优先”为修会的宗旨。圣母圣心会会士秉持这修会精神在中国生活了 90 年之久。

南怀义 (Theophile Verbist) 于 1862 年创立圣母圣心会。他在修会宪章第一章第一条中明确记载：圣母圣心会会士以“优先在华人中福传” (……apud populos Sinenses)。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母圣心会以“中华优先”。在拉丁文原文中，会祖南怀义并没有指定中国，而是指中国人 (中华、华人)。从 1865 年至 1955 年的这九十年当中，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中国北方 (塞外地区) 大力开展福传工作，范围遍及热河和整个内蒙古，直到甘肃以及新疆的伊犁，横跨 4 千公里。当时这些地区都是未开发没有道路的贫瘠之地。传教士们只能以骑马、乘坐马车、骑驴或骑骆驼代步。共有 679 名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年轻传教士跟随南怀义神父的脚步前往中国塞外地区传教。他们在西湾子、集宁、热河、赤峰、绥远、宁夏、大同、兰州、天水、平凉、新疆等教区奠定了传教根基。透过他们的努力，这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人数从 6 千人增加到 25 万人。从大同修院和绥远修院 (两所备受好评的修院) 毕业的中国籍教区神父一共有 250 位。圣母圣心会离开塞外地区后，就是这些教区神父继续照管这些教区的。他们当中有四位后来祝圣为主教，继续负责管理教区的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旅行并非易事

圣母圣心会神父们在农村地带传播福音，贴近老百姓，与他们同甘共苦为生活奋斗，一起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他们尤其在改善农村百姓健康状况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21 年吕登岸神父 (Joseph Rutten cicm) 主动在绥远 (呼和浩特) 盖了一座设备完善的现代化医院，称为“公教医院”。医院设有 150 张床位、放射科、手术室以及护理学校。在上海毕业并在鲁汶大学 (比利时) 深造的中国籍医生们，以及后来加入圣母圣心传教修女会 (ICM) 的团队一起指导管理该医院的医疗服务。那是内蒙古地区方圆 600 公里范围内设备最高级完善的医院。他们在当地也设立小诊所并构建了一个医疗网络，如此，在农村服务的传教士们可以将生病的教友和非教友送到绥远接受特别治疗。²



圣母圣心女修会医疗服务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抵达后不久便开始在整个塞外地区的乡镇和乡村盖了数百所中小学，有男女学校，并形成教育网络。在那个时代，为女孩提供教育机会，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吕登

1 圣母圣心会宪第一条的拉丁原文为 “Apud populos Sinenses”，意思是“在中国人 (华人) 当中”。

2 1952 年传教士离开绥远时，该医院被当地政府接管。公教医院后来发展成内蒙古大学医学院。2021 年，医院庆祝了开院 100 周年。医院院长给罗马圣母圣心会总会长 Charles Phukuta 神父写了信，希望邀请他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讲。因新冠疫情之故，总会长不可能成行，但提供了一段预录致词影片。他对于老传教士在呼和浩特本地曾付出的努力、交流与合作致上正面的高度评价。Phukuta 神父的演讲受到了好评；我们也把这消息转告 Phukuta 神父。

岸神父 (Rutten) 积极推动这工作, 并在学校校长们的帮助下制定了教学课程。同时, 他也在南壕堑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他们甚至在鄂尔多斯为蒙古儿童设立了一所学校, 用蒙古文教学, 那可是一项既独特又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石扬修主教 (Bishop Gaspar Schotte) 到天津购买重型印刷机, 然后用火车运送到包头。到了包头, 他们用浮筒将机器搬移渡过黄河, 再用特制的牛车运送。牛车需要用三周的时间穿越过鄂尔多斯沙漠才能到达城川传教区 (Poro Balgasu Mission)。石扬修主教亲自在城川组装了印刷机并印刷了数十本关于蒙古文、文学和历史的手册。这些手册都是由圣母圣心会神父以及蒙文老师一起编写的。那是整个传教区独一无二的蒙文学校。学校和印刷厂后来于 1930 至 40 年代被军队给摧毁了。

圣母圣心会于 19 世纪末做了一件闻名遐迩的事情, 就是对塞外地区农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圣母圣心会神父在黄河一带获得了数万公顷的农地, 他们在那里挖凿了数百公里长的运河, 引取黄河河水灌溉农田。他们召请农民们前来居住耕种, 因为这里的土质和收入与他们以前所在之地来得优渥。此大幅度改善整个地区人民生活条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赞许。后来, 此项黄河弯沿大工程于 1920 年代移交给当地政府管理。



在西湾子, 圣母圣心会甘宝真神父 (Raskin) 指导绘制地图

圣母圣心会在北京也成立了“南怀义学苑” (Verbist Academy), 那是几位著名圣母圣心会自学成才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他们有的在辅仁大学任教、有的与德日进神父 (Theillard de Chardin) 一起合作积极投入于研究工作。另外, 有的会士精通于蒙文和汉文, 有的则成为历史和考古研究、地理、哲学、制图学、鸟类学、中国宗教艺术以及建筑学等方面的专家。

圣母圣心会神父在中国处于艰难困苦的时代, 仍毅然决然选择到中国。他们的抉择完全处于个人自由意志, 并且做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心理准备。中国是他们心甘情愿认定的第二故乡, 他们决定把一生奉献给这个国家, 有的甚至一去不复返, 从此不曾回家。他们的父母对于爱儿“中华优先”的抉择也表示认可及接纳。252 位圣母圣心会神父在中国度过余生, 并安葬于中国。他们当中有 88 位死于斑疹伤寒而且是英年早逝, 有的到中国一两年后就逝世。³ 另外, 有的在中国内乱期间丧命或殉道, 其中 8 位死于义和团起义、12 人死于 1940-50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时期。

254 位圣母圣心会神父 (1950 年) 被驱逐离开中国, “中华优先”的使命因此陷入危机。当中国 (于 1978 年) 再次开放, 台湾圣母圣心会不得不在修会内为此敲响警钟。

254 位圣母圣心会神父 (于 1950 年) 离开中国后, 只有一小部分会士继续在台湾和香港服务, 尽力维护“中华优先”的使命。后来, “中华优先”逐渐不被圣母圣心会视为首要使命时, 也就是这个少数群体肩负起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修会在其他国家开展了新的传教工作, 也开始招收不同国籍的会士。因此, 圣母圣心会原本聚焦于在中国的传教使命也起了变化。事实上, 此改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修会有了新的关注点和新的优先选项。圣母圣心会在台湾的团体基本上也认同和接受这改变, 然而当中国 (于 1978 年) 宣布开放政策时, 台湾省会认



指控传教士从事间谍活动, 被驱逐中国

3 圣母圣心会吕登岸神父 (Rutten cicm) 主动在中国境内生产一种预防疫情扩散的疫苗。吕神父在罗马拜访教宗庇护十一世时, 教宗 (曾在波兰大使馆任职) 告知吕神父波兰的 Weigle 医生发明一种针对斑疹伤寒的疫苗。吕神父二话不说前往波兰邀请 Weigle 医生到中国, 加入了绥远天主教医院团队。他们与圣母圣心会以及辅仁大学合作, 生产了抗斑疹伤寒疫苗, 该疫苗自 1930 年以来挽救了数十位传教士以及更多的中国人性命。

为有必要在 1981 年召开的修会大会中，提醒修会勿忘“中华优先”的初衷，他们为此向修会敲响了一次警钟。我就是台湾团体其中一员，我认为此时跟大家报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为至关重要。

1974 年，我被选为圣母圣心会副总会长，因此被派往罗马总会工作。那个时期碰上毛泽东的去世，也目睹中国因此开始产生变化。我们在总会的日常会议中经常针对修会关注的议题做讨论，我注意到圣母圣心会对中国的关心已不如从前，而且逐渐把焦点转向他处。我一方面完全支持圣母圣心提倡将注意力转向南美洲，说实话当时这也是整个教会的普遍优先选项。然而，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圣母圣心会总会有责任提醒参议会成员尊重我们修会宪章清楚阐述的“中华优先”。尽管中国仍然把外国传教士拒于门外，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它固有的文化，对整个教会福传使命是一个大挑战，不能被忽略。圣母圣心会创始人南怀义神父的初衷就是派我们“与中国人一起”工作，而中国人遍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关注南美洲的传教需求不应以牺牲会祖南怀义的“中华优先”为代价。然而我们当时的日常会议议程则一再证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让我感到极为震惊，在罗马总会工作的七个年头，身为中华省会的一份子，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表达我内心的担忧，也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⁴

当时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即将对外开放。修会于 1976 年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办事处，由修会总会以及台湾省会共同资助，以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方向为任务。邓小平于 1978 年提出中国开放政策后，我们于 1980 年在香港举行了一次“圣母圣心会中华省会议”（CICM China Meeting）。参加的会士人数有 12 位，包括了年老和年轻的会士。在那整整 3 天的会议中，修会安排了专家给我们讲解中国开放政策的意义，并提出建议。然后，我们再利用两天的时间反思这对圣母圣心会意味着什么。我们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及建议，呈交给圣母圣心会总会，请求他们积极对中国新形势作出积极具体的响应。我将报告带回罗马与修会总会分享。总会决定将此议题纳入圣母圣心会（1981 年）第九届总大会议程，并委托我在会议中为此议题发言。

台湾圣母圣心会在“圣母圣心会第九届总大会”，针对修会“中华优先”的使命敲了警钟，总大会呼吁圣母圣心会总会积极响应中国的开放政策。

在那一次修会总大会中，令我们感到讶异的是，总会指导委员会以“没时间为由”将我们“香港报告的讨论议题”拖延了两次，最后甚至将该议题从议程中跳过，直接进入总会长和参议员的改选环节。但改选后，新的总会长和参议会也未另安排时间讨论“香港的报告”。因此，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他们只在临时会议中让大会投票表决，呼吁圣母圣心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响应中国的新形势。即使此议案在大会中获得了多数赞成票，但出乎意料的是该议案并未获得一致性的通过。该结果释出了一个关键性的信号，表示我们圣母圣心会某些会士对于“中华优先”的使命保持质疑的态度。该“质疑”可以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暗示，台湾代表团对此非常在意，于是准备赶紧按照总大会的要求拟定一份提案交给总会。当时，台湾代表团对该信号的解读和感想是：我们要是不做，就没有人会做了。“中华优先”依然是我修会宪章的优先选择。事不宜迟，拟定提案的工作应该立即展开。

开完会，我立刻被省会委派草拟那份提案，让我拟好后提交给省会参议会审核。我在罗马连续工作了 7 年之久，那一次在罗马总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即刻投入了这项新任务，毫无间息。那份坚持直至今日亦然如此。1981 年 9 月，我拜访了鲁汶大学，探询他们是否有兴趣与我们合作从事与中国交流的合作计划，鲁汶大学给予了正面的答复。之后，辅仁大学的罗光总主教也对我们的计划表示全力支持，尤其肯定我们准备与高等学府合作促进学术交流的想法。接着，我又到了欧洲、美国和日本会见了曾在中国传教的圣母圣心会神父和学者。他们当中有的在被驱逐出境之前曾在中国受过数年的牢狱之苦。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诫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十分小心！”但即使被迫离开中国三十年后的他们，忠于“中华优先”的精神远超过他们的反共情绪。他们对南怀仁基金会的提案表示赞许。



罗光总主教

⁴ 圣母圣心会总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都有几位具有中国背景的恣意员。此现象随着时间而减少。我们后来会注意到，直至今日，我是最后一位圣母圣心会总会“中国籍”成员。

当然，听取中国教会和中国学术界的意见更是至关重要。中国基督教（圣公会）丁光训主教提供了我一个大好机会，邀请我参加1981年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中国会议”。我在那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见到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天主教傅铁山主教、基督教的丁光训主教等人，并交换了意见。他们主动建议我们与鲁汶大学合作，认为那是与中国进行交流最理想的方式。后来，在1982年5月，我在北京访问期间也听取了我国“非官方”天主教教友的建议。对于我们的想法，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在1981和1982年期间，两度到罗马向圣母圣心会总会汇报进度。1982年年中，我将拟好的南怀仁基金会蓝图提交给台湾省参议会，审核后通过。



1985年，赵复三在鲁汶

1983年，圣母圣心会各省代表齐聚罗马，讨论并批准了南怀仁基金会计划。但总会要求台湾圣母圣心会自行承担南怀仁基金会的所有活动及费用。

对此计划，圣母圣心会总会理所当然希望获得整个修会的反应，因此在罗马召开了为期4天的修会总会议。来自各省会的代表当然包括台湾省代表都赴罗马开会。台湾代表团人数最多，他们在那次总大会中介绍了南怀仁基金会的提案。会议一开始，总会参议会就公开表态他们将只以旁听身分列席会议，此举让我们深感讶异和失望，甚至感到疑惑。倘若总会参议员不投票，一旦总大会通过了此提案，他们是否真的会承诺支持南怀仁基金会？

在会议的上半场，修会邀请了外面的中国专家就中国的现况做演讲。随后轮到台湾省代表介绍成立南怀仁基金会的计划，表明南怀仁基金会在总会的要求下作为圣母圣心会为中国教会服务的一个单位。此议题透过小组和整体的形式进行了讨论。最后获得全员一致通过。正如事先所表态，总会参议成员没有参与投票。

会议结束后，总会参议会做了个评估。于是，总会长给中华省（台湾 - 香港 - 新加坡）写了信，表达总会决定让中华省来指导和资助南怀仁基金会的活动，理由是此计划一开始就是由中华省提出的。中华省会长回信表示愿意接受此挑战。后来，他以省参议会的名义向罗马总会提出申请，希望获得资金补助或贷款形式的财力支持。然而，总会的回答是无法提供帮助。中华省在感到失望和错愕之余，意识到这件事只能靠自己。

早在1970年代，我就观察到圣母圣心会对会祖南怀义定下的“中华优先”精神逐渐在淡化。修会第九届总大会那一次一致通过支持圣母圣心会“中华优先”的议案可以说是一个警钟。总会后来决定不支持全体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南怀仁基金会计划，似乎是对圣母圣心会的一种辜负，亦或是修会的一种失败。因为会祖南怀义在创会时就将“中华优先”列为修会首要使命，重视拥有非常丰富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向中国人传教是整个教会关切的重心，圣母圣心会又怎能忽略这一点？这种认知促使我们台湾代表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我们清楚知道，即便我们只能靠自己，但也不会孤单，因为我们有朋友。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台湾本地教会密切合作，并从一开始就相信台湾神职人员和教友肯定会贡献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智能来指导南怀仁基金会如何面向挑战。南怀仁基金会一路走来证明了我们与本地教会之间是建立在信任这根深地固的基础上的。

台湾圣母圣心会主导了“南怀仁基金会”二十三年，全仰赖与台湾教会的合作。

从1983年到2006年，台湾圣母圣心会主导了南怀仁基金会在短时间内开发的许多活动项目，包括与台湾教会和中国大陆教会相关的牧灵合作项目、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华省会长及参议会都会参加基金会一年一度的全天“中华省会会议”，听取南怀仁基金会的活动、财务报告

和预算审定，这些事项都经过讨论和批准程序。活动报告也会刊载在圣母圣心会月刊 *Pedicab*。省会也发行了 *Verbist Study Notes* (南怀义研究笔记)，刊载有关中国大陆使徒工作的消息。

南怀仁基金会各种领域的活动全靠台湾教友和鲁汶(比利时)的同事：罗友梅、郭彬生、陆白鹤(*Staf Vloeberghs*)等人的付出才得以实现。虽然南怀仁基金会是个小机构，但却采取大胆的举措访问中国天主教会，与他们开展对话和交流，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团体南怀仁基金会都不偏不倚、不带偏见或区别心。在罗马教廷默许下，南怀仁基金会毫不犹豫地邀请了中国第一批官方天主教会友谊代表团访问鲁汶大学和比利时教会，进行了13天的访问。开放对话从一开始就是南怀仁基金会的标志和特点。来自台湾的两位主教，贾彦文总主教和狄刚总主教先后在比利时主持“敬天祭祖”感恩祭典，并在比利时电视台播出，受到比利时广大信众的热烈反响。南怀仁基金会也曾邀请并陪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访问比利时，受到鲁汶大学的正式接待，并在比利时多处教堂演讲。

2006年起，圣母圣心会把南怀仁基金会转移至“鲁汶南怀仁基金会”。今天的南怀仁基金会是由东西方的手足般基督徒团体所组成，与华人进行交流对话。

2006年，南怀仁基金会的活动已超出台湾圣母圣心会的能力范围。罗马总会出人意料地同意台湾圣母圣心会退出南怀仁基金会，让南怀仁基金会自己设法另寻合作伙伴继续运行。比利时玛琳教区单尼尔枢机主教(*Card. G. Danneels*)一直密切关注且对南怀仁基金会的主张和工作表示高度认同。当他得知我们的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欢迎南怀仁基金会转移到比利时，南怀仁基金会在比利时正式登记立案为非营利组织，正式名称是“鲁汶南怀仁基金会”(VFLeuven)。枢机主教也答应担任基金会主席。后来，南怀仁基金会成立了常务董事会来指导其日常活动。隶属于南怀仁基金会的“鲁汶南怀仁研究中心”，保证了南怀仁基金会与鲁汶大学的密切合作。后来在台湾也成立了“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让南怀仁基金会在台湾取得合法身分，同时与台湾教会以及辅仁大学的合作更加顺畅。狄刚总教于2021年从“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职位退休，但继续受邀担任协会的神师。陈方中教授被选为新任理事长，杨敦和校长以及安德兰修女(*Tessie Enriquez ICM*)被选为协会常务理事。

目前的南怀仁基金会管理团队设在比利时鲁汶，由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比利时)De Kesel 枢机主教主导。南怀仁基金会不认为自己属于西方或东方，它将自己视为一个国际性富有手足精神的基督徒团体。南怀仁基金会是一个由台湾圣母圣心会及台湾教会所成立和发展的机构。狄刚总主



2000年，在台北圣母圣心会中国项目计划会议



1989年，Beda Chen、罗友梅、郭彬生
韩德力神父访问西安



2007年，在布鲁日的 Sint-Andreas 中国主教培训班

教(台北)、刘玛丽教授(阿姆斯特丹大学)以及 Phukuta 神父(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是基金会董事会的三位副主席。Phukuta 神父也是基金会常务董事总务。董事会成员包括来自三个不同修会会士。除了延续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义神父(Theophile Verbist)提倡“中华优先”的同时,南怀仁基金会也推动与华人之间的对话、合作与交流(在中国华人中)。只要情况允许,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加入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

结论

我愿意藉此文分享这 40 年(1982-2022)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的部份(非全部)。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提及这些往事并不重要,但如今我意识到我可能是唯一能掌握全部事实的人,原因在于:我自从南怀仁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每天 24 小时地守护着这基金会,40 年来始终如一。我认为自己欠南怀仁基金会历史一个交待,同时也欠过去和现在的同事所付出的功劳一份感谢,至少我认为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上述历史。此文所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基于南怀仁基金会的档案数据。撰述南怀仁基金会历史,要是忽略了这些历史事实既不客观也不公平。南怀仁基金会的客观史实必须清楚表明以下两点:

1- 如果没有台湾圣母圣心会团体在 1970-80 年间毅然决然采取的举措,就没有今天的南怀仁基金会。

2- 如果没有台湾教会神职人员、教友的付出、贡献以及他们的通力合作、专长和指导能力,南怀仁基金会无法从危机和难关中幸存。

南怀仁基金会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编纂而成,全凭“台湾圣母圣心会”与“台湾本地教会”多年来携手建立的“密切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就南怀仁基金会而言,这长久的合作关系经由在台湾成立“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而更加巩固。

只要了解中国教会历史的错综复杂:从不平等条约(1860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 年),就会明白要成立一个像南怀仁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本着南怀义的精神,旨“在华人中”发展公开对话、交流与合作,实为一项历史性的挑战。上述的几段历史性危机时刻,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是可以预料的。我们选择面对及克服、做了种种充分准备而存活下来。

南怀仁基金会经历了这段历史后,“今日的南怀仁基金会”堪称为一个“喜讯”、是个不言而喻的好结果。圣母圣心会总会长 Charles Phukuta 神父是基金会副主席之一,也是基金会主席 De Kesel 枢机主教的常任代表。另两位副主席是狄刚总主教和刘玛丽博士。来自 3 个不同的传教修会的代表(圣母圣心会、仁爱兄弟会、圣母圣心爱子会)也加入了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期待未来有来自中国的代表能够加入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南怀仁基金会这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危机但幸存下来。当南怀仁基金会遭受教会内弟兄的批评时,南怀仁基金会能理解他们;认为他们尚未做好对话的准备。当我们得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密切关注南怀仁基金会所主张的对话时,的确深感高兴和欣慰。今天,南怀仁基金会一方面在与中国对话的道路上忠实地追随教宗方济各的脚步,另一方面,对一些在当前复杂局势中犹豫不决的人也表示理解。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无非是继续忠于“中华优先”的福传使命,与此同时另一个挑战是继续坚持“与本地华人教会建立友好合作与团结合一”的理念。南怀仁基金会的“使命宣言”清楚表述了“今日南怀仁基金会”的宗旨与精神。只要我们在这精神下保持一致、一心一德,就能确保南怀仁基金会的美好未来。



韩德力神父、Ren é Stockman、
De Kesel 枢机和 Phukuta 神父